



国故新知

钱文忠 著

我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文化悠久的国家，总还是有“国故”的。而“国故”虽然古老和沉重，却也应该可以为我们后人带来“新知”；“新知”尽管稚嫩和轻扬，却也未始不可以调兑“国故”的陈酿。当然，这也是说说容易罢了，真要做起来，恐怕是十分困难的。

—— 钱文忠

国故新知

钱文忠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故新知 / 钱文忠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458 - 0109 - 5

I. 国… II. 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461 号

国故新知

钱文忠 / 著

责任编辑 / 沈佳茹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86,000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109 - 5 / I · 43

定价: 1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次

王元化先生与莎剧	I
“国学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5
国故与新知的称星	II
又一代人的学术史研究	23
恒逻斯之战	31
也说文化接榫期	38
俗文学·民间文艺·文化交流 ——读美国梅维恒教授的三部近著	44

出入世间:宗教与商人	59
年代——历史学的终结?	68
命缘之间	75
如此“整理”	79
“精选”与“集粹”	
——《蓟门散思》编后记	84
延华学于一脉	
——《华学》(一)读后	86
真实的北大	92
神秘的千年古城楼兰	98
能不忆敦煌	102
还是要学好文言文	106
历史,无法抗拒假如的诱惑	112
比大小和看热闹	
——也说《冰海沉船》与《泰坦尼克号》	115
对子的起源	120

对子与语文化程度	123
联圣大方	126
袁世凯父子与联圣大方	130
张伯驹与对联	133
苏东坡的巧对	137
也说纪晓岚	141
章太炎的对子	145
尽显风云际会	149
气度胸襟毕现	153
进退皆成对联	157
民愤隐于对联	160
褒贬不只在对联	164
异音同字联	168
后记	172

王元化先生与莎剧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王元化先生在莎士比亚塑像揭幕仪式上曾经引用歌德这句话，赞叹莎翁的戏剧不仅涵盖了浩瀚的人生，而且蕴含了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与日月而同久，保存着尚未被揭示的意蕴，展示着尚有待认识的哲理。在花几个夜晚读完了元化先生与夫人张可先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共同翻译（其实远远不止是“翻译”）的《莎剧解读》之后，窃以为这句话也可用以形容两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与莎翁隔世相契的精神因缘。

元化先生坦承他这一代人的文学思想是在五四新文

化观念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然无法摆脱具有强烈意图伦理、多重功用的五四文学思潮的影响。因此，青年时代的元化先生不能接受莎翁古老的语言表达方式、繁缛的隐喻与双关语、多少略带矫饰略显造作的技巧，把莎翁看作一位已然过时的伟大天才，当然也就不可能领悟莎翁洞见人类心灵的深邃观察力。1930年代末以及整个1940年代，元化先生沉浸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之中。在光芒四射的俄罗斯文学思想家中，对黑格尔独具慧心的别林斯基用自然派来命名果戈理时期的文学现象，精辟论述并系统阐发了以人道主义为内容的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他的艺术鉴赏力在出自学识的同时，更多地源自思维活动中特具禀赋的领悟能力，不仅深深吸引了元化先生，而且在极大程度上为元化先生后来走近莎翁预设了精神桥梁。

1950年代初，元化先生读了梁译《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撰写了《汉姆莱脱的性格》，开始认识到莎剧的耐人寻味，决非俗文俗作之可比，汉姆莱脱的犹豫迟疑促使元化先生用了近十年时间加以思考。时代与思绪一同

走到了 50 年代下半期,元化先生和夫人长达二十年的磨难开始了。我们这一代是无法想象两位老人的痛苦经历的,但是,从惨遭迫害丧失了读写能力的张可先生身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历历在目。以待罪之身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元化先生在获准读书之后,将读书范围集中在马克思、黑格尔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方面,以极其刻板的方式争分夺秒全神贯注地读书。莎翁对人及其灵魂的描写震撼了元化先生。无数人在仓皇告别或逃离理想主义的名义下背叛了理想,莎剧展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德国古典哲学蕴含的思辨力量为元化先生提供了坚守理想的无穷动力。元化先生从《奥瑟罗》中感受到了“珍惜自己的名誉,固然令人钦佩;珍惜公正,则更令人敬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化先生采取了相互联系、彼此参照的方法来阅读上述三位伟人的著作。比如,1953 年版郭王合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第五节提到门纳尼亚斯·阿格列巴的“无稽的寓言”,译者无注,元化先生在《科利奥兰纳斯》里找到了出典;《思辨随笔》中收入了诸如“黑格尔论莎剧的偏见”等条。其实,这又何止仅仅是读书方

法的问题，元化先生说过：“等到我从黑格尔美学中理解到形象的表现方式正是艺术家感受和知觉的方式，我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原载《青年报》1998年4月24日）

“国学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以《学人》的出版为标志,“学术史”研究渐成显学。近几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被现当代中国历史湮没已久的不少著名学者,由于学术史研究探根溯源之功,纷纷从人们的记忆深处泛起,重新引起学术界、出版界乃至传媒的注意。国人与传统文化隔绝过久,加之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日益发皇,于是,一般被视作“国粹”之精粹的“国学”地位日高,自然不难理解。在此大背景之下,上述这些“出土”学者的精神取向、学术师承、专业分野、治学方法等等方面,却未及得以仔细考辨,

而被世人竞相一律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了。

“国学大师”其逝矣，后来传承衣钵的托命之人何在？这就不能不成为人们极度关心的问题。近来，国内不少大学热衷于开办“文科基地班”、“国学班”甚至“大师班”，正是这种迫切心情的反映。这些“班”举办亦有年矣，其成效如何，实在是难说得很，但是，我总相信，预其役者的心里应该是明白的。在我看来，即使不能说这类“班”都是失败的，那么，起码也是与开设这些“班”的初衷和理想值相距甚远。这个判断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管见，若要反驳却也并不见得那么容易。

最近的说法似乎又有所改变。据一所名校的“国学院”的主事者说，之所以要开设“国学班”，乃是为了满足一些大公司的急切需要。据说，很多大公司对“国学班”毕业生极感兴趣，热烈欢迎他们日后前往就职工作云云。这不是向壁虚造的，而是见诸于正规媒体的采访的。对这些不知所云、不明所谓的妙语，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所以，我只能这样回答屈尊前来采访我的记者：

国学的宽泛化，的确体现了现在的人们对历史，对祖

先的关切，希望能领悟感受自己所属民族的文化之根和血脉。但对于“普及国学”、培养“国学大师”这些做法，我的看法是“其心可佩，其志可嘉；想法可笑，效果可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虽然也会面临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但至少是连续的，而我们断裂得特别厉害。现在要说什么国学的“承前启后”、“发扬光大”，是不可能的，我看只能“守先待后”。

这些话委实既不豪又不壮，必定会有不少“有志之士”不以为然。然而，我这么说，却也有我的理由。最要紧的还是应该真正地弄明白“国学大师”究竟是怎样培养出来的。这当然是个极大的课题，绝不是一篇短短的随笔可以说清楚的。还是来看看两个例子吧。

一个例子是个人，且并不是离开我们非常遥远的古人。周一良先生(1913年1月19日—2001年10月23日)的国学根底在学界无人不佩服。周先生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主要是得自八岁起在名师执教的家塾就学十年的这段经历。当年的“一良日课”是这样的：

读生书 礼记 左传

温熟书 孝经 诗经 论语 孟子

讲 书 礼(每星期二次)

看 书 资治通鉴(每星期二四六点十页)

朱子小学(每星期一三五点五页)

同用红笔点句读如有不懂解处可问先生

写 字 汉碑额十字(每日写)

说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烦请先生略为讲音训

黄庭经(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纸景写二月

请问,今天还有多少人真切地了解“读、温、讲、看”的区别?当时在周家执教的古文字学大家唐兰先生盛赞少年周先生“其人少年,学有根柢”。“根柢”实不同于今天泛泛而谈的“基础”,盖前者重纵深,后者重平面,正是中国传统世家式精英教育与现代普及式大众教育分野之所在。这种教育的功过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培养国学大师是切实有效的。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周一良先生周年祭》里非常平实地提到:“周先生还送过我几种

古籍，其中《封氏闻见记》二册是他亲手校勘过的，从书尾所记干支看，是他二十出头所读。这样的读书方法跟今天的‘短平快’的读书相比，可以看出不同年辈的人其国学根底的差异。”就是明证之一。刘成禹《世载堂杂忆》将教育模式分为“俗学”、“崛起”、“世家”三类，自有其深意。虽说也不是没有例外，虽说国学大师不必尽是世家出身，但是，世家的教育模式、文化氛围，更有益于培养真正的国学大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时至今日，世家或者世家式的教育早已灰飞烟灭。正可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再一个例子是机构，就是鼎鼎大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离我们也并不太远。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成功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批量”培养出符合或者接近“国学大师”标准的人才的机构，这是唯一的一家。研究院本身已是一个热门的学术课题了，孙敦恒先生编著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堪称标准著作，有心人自可参看。别的不必说，从由吴宓、王国维等先生的起草的《研究院章程》来看，它的宗旨简单明了：“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目的朴实明确：“目的专在养成左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

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

《研究院章程》之六“研究方法”更是精义毕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同一科目，尽可有教授数位并任指导，各为主张。”“教授学员当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俾养成敦厚善良之学风，而收浸润熏陶之效。”而担任专任教授的“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正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已是久播于学人之口的了。

有斯院，有斯师，而有斯才，正此之谓。

敢问发愿培养“国学大师”的主事者，是否也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两个例子呢？只要稍微熟悉一点现代学术史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例子是不在少数的。今天，大概在经费的充裕的方面，或许和过去尚有可比，敢问其他呢？还有吗？

国故与新知的称星

根据汤一介先生编写的《汤用彤著译目录》(《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417—420页,又见《燕园论学集》第501—505页),我们一向只知道汤老先生的第一篇文章是1922年发表在《学衡》第十二期上的《评近人之文化研究》。而最近出版的汤锡予(用彤)先生论文集《理学·佛学·玄学》,前六十页内所收的文章均发表于1917年之前。而正是这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文章,可以使我们悟出中国现代学术界上的一段令人扼腕的往事。

读这些文章,首先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不用说别